

## 戏谈魏晋南北朝式的“洒脱”

张伯昭

宋朝辛弃疾在《鹧鸪天》词中曾用十分钦羡的语气称赞东晋大诗人陶渊明道：“晚岁躬耕不怨贫，只鸡斗酒聚比邻。都无晋宋之间事，自是羲皇以上人。”的确，这位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的陶公可以说是魏晋时期士大夫阶层的典型代表，他本出身于名门望族，其先人陶侃在东晋政府的北伐战争中立过大功，但传到陶渊明这一代时，家道已经中落，大官当不成，小官又不愿意当，遂归隐山林，过着宁静悠闲的隐居生活，并写下了脍炙人口的《采菊》、《桃花源记》等不朽名篇以述其志，其作品中隽永清致的风骨，一直为后世的文人墨客所称道。

其实，纵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整个士大夫阶层可以说都过着相当“洒脱”的生活，上至帝王将相，下到小吏、隐士，无不以终日闲坐、捉麈尾清谈为高风亮节，而以忙于处理日常政务为俗不可耐，其间多少奇闻趣事，在当时人的眼中目为“上品”，但在滚滚红尘中的现代人看来多少有些傻气和怪异，如刘伶的嗜酒如命、阮籍的母丧不哭，再如王坦之（书圣王羲之的族人）雪夜突发奇想，坐船去探访百里之外的好友戴安道，船走了将近一夜，到了戴家门口，王老先生却决定回去，别人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：“吾本乘兴而来，兴尽而返，何必见戴？”，于是乎雪夜访戴的典故就流传了下来；又如淝水之战前故作镇静的丞相谢安，其实他心里异常烦乱、对战争的胜率并没有把握，但嘴上却没事人似的总是说“另有安排”，宴会游乐一切照常进行，让人觉得他特别胸有成竹，一般来说装腔作势的人往往到头来都会自我暴露，弄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，但谢安的运气出奇的好，他的侄子谢玄在前线戏剧性地把握了战场上的时机，充分利用了敌军内部的矛盾，居然一战而胜，使得淝水之战成为中国历史上事先未经周密准备、但终又以少胜多的绝无仅有的战例，它不只让谢氏家族名扬千载，也使当时中国的统一推迟到二百年后的隋朝才得以实现；更有甚者如梁武帝萧道成，竟然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做，舍身去做和尚，害得大臣们慌忙凑足一亿钱去替他“赎身”，大概这一来一往皇帝佬儿觉得特别过瘾，所以闹剧他一而再、再而三地玩儿个没完没了！但也许他太过于注重“弘扬”佛法，政务上自然疏忽了些，所以不小心让个反复无常的侯景造了反，这样一来不仅做和尚的把戏玩儿不下去了，而且还赔上了自己八十多岁的老命！

那么，人们不禁要问：是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大环境奇佳，人民安居乐业、生活美满富足，士大夫们无所事事，竞相垂拱而治，所以才行得这般潇洒呢？其实恰恰相反，从公元220年，曹丕称帝、建立曹魏政权算起，到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中国止，这三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处于空前的分裂和混乱之中，此间政权交替如同儿戏，北方胡族不断南侵，曾经称帝的人多得不计其数，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势，其中暴君的数量也远多于历史上其它的任何一个时段，如少数民族中的苻生、石虎、赫连勃勃，汉族的刘子业、萧昭业和萧鸾等，这几位之所以出名，杀人如麻暂且不论，杀人手段和花样更是多得令人发指；此外这几百年更是盛产昏君，如晋朝就颇出了几位傻瓜皇帝，南朝也不甘示弱地有东昏侯萧宝卷和陈后主与之媲美。最高统治者如此，普通老百姓的困苦就可想而知了！生活困顿不堪，为躲避战乱，流离失所，远走他乡，而且大乱之后，大疫继之，丧亡更加惨重，如曹丕在《与吴质书》中说：“昔年疾疫，亲故多罹其灾。徐陈应刘，一时俱逝”的记载，讲的就是当时的一场时疫之后，建安七子竟然染病死了一半多！上层士大夫在疫疾中的死亡率已经如此之高，小老百姓就更如蝼蚁般陈尸累累了，在当时，十室九空该不是虚言！

在如此混乱的社会大环境下，试图励精图治、建功立业的帝王将相也不是没有，如雄才大略、文治武功的曹操和尚称文武兼备的曹丕父子，统一战争功亏一篑的氏族皇帝苻坚

（就是淝水之战中失败的一方），中流击楫、一心北伐的名将祖逖，行伍出身、不忘本色却养了一群不肖子孙的宋武帝刘裕（刘寄奴）等，他们却或因自身才智所限，或因时势所拘，功业未竟，实在令人扼腕叹息！

反观当时的士大夫阶层，绝大多数大概都已“认清形势”，知道国事已实不可为，且又看到“人生苦短，去日苦多”，大有朝不保夕之势，又何苦去愁什么国事、天下事呢！所以人人都有一种及时行乐的观点，认为：“生年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；岁月不我待，何不秉烛游”！但说到底，当时人物的种种“风流”怪行不过是一种古代版本的“鸵鸟政策”罢了！

读史到此，千岁忧也发完，就此搁笔。